

## 自由竞争与自然秩序

——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

“……

可是把亚当·斯密的著作读过，  
就成为造诣高深的经济学家，  
就能够懂得：  
国家如何富强，  
如何生存，  
……”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二百多年来，性格孤独的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世界中似乎始终占据着无与伦比的地位。现代经济学的面貌与亚当·斯密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其研究内容广泛到了几乎包罗万象的程度，其研究方法发展到了几乎数学家都看不懂的程度，其学科地位提高到了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程度，然而，她依旧没有摆脱亚当·斯密所赋予她的灵魂和气质。现代经济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经常翻翻这位创始人的经典著作，对于启迪思路、摆脱迷津，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性，它似乎是一片永不枯竭的经济思想的矿藏。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约二百年后，在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开始涌起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人民生活走向小康和富裕，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展露出勃勃的生机。在惊叹市场竞争所创造的奇迹的同时，如果人们静下心来读几页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情不自禁地睁大眼睛：这位两个多世纪以前的哲人，多么深刻而细致地阐明了市场机制，多么自信而正确地预言了市场奇迹！

当然，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是与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融为一体的；他的伦理学思想也极为深刻。亚当·斯密的思想中也存在莠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凭借科学理论与智慧之光去理解和辨别，这也是一个提高自己的经济学修养和思想修养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先从亚当·斯密的生平开始介绍吧！

## 宁静的独身生活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小镇——法夫郡的柯卡尔迪。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兼本地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死去了。在斯密的整个幼年和少年时代，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即使在斯密长大成人成为著名人士之后，母亲也始终是他生活的中心。小斯密是个瘦弱的孩子，从幼时就形成了独自凝想和自言自语的癖性，终其一生没有改变。在他成年之后，这种癖性偶尔会给他惹点小麻烦，因为正在对他娓娓而谈的客人有时会发现：斯密突然陷入了某种出神状态，对刚才的谈话根本没有听见！

据说，斯密小时候曾发生过一件危险而有趣的事。他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外祖父家，途中被一群流浪的吉卜赛人拐走了，一时家人无处寻找。幸而有位过路人说，他曾看到一个吉普赛女人抱着一个哭叫不已的孩子走在路上，于是人们心急如焚地匆匆追去，终于将这位未来的大经济学家救了回来。

斯密青少年时代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就读的柯卡尔迪市立学校，是当时苏格兰第一流的中学。他喜欢读书，学习勤奋，而且记忆力很强，是个引人注目的学生。柯卡尔迪这个小镇，成为他观察和了解社会的起点；与各种人物——从贵妇人到煤矿工人——的接触和交往，以及流传的许多有关商业、走私的故事，丰富了他的知识。这个小镇上当时有一两个制钉作坊，斯密经常跑到那儿看工人干活，据说他就是从那儿得到了关于分工的原始概念。

14岁时，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专心研究语言、数学和自然哲学。他在大学里受到了哈奇森教授的深刻影响，接受了他充满自由精神的新思想。斯密终生强烈地热爱一切合乎理性的自由，与这位思想家的启迪是分不开的。哈奇森还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自然法学的一个分支进行了较系统的讲授，从这里，斯密最早接触到产业自由学说。在哈奇森的指导下，斯密已能整理自己的思想，并学会了独立思考。哈奇森把小小年纪的斯密介绍给了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后者成了斯密的终生挚友。

17岁，斯密从苏格兰骑马前往牛津，从此在牛津大学一呆就是六年。这所曾以学术中心和英国显贵之母校而闻名世界的大学，当时却处在一种愚昧、昏聩的气氛中，校园内严格禁止近代理性主义著作。斯密后来写道，“教授们以照

本宣科的办法，来代替他们对所教学科的解释。但如果这些书本是用僵死的文字或外文写成的，那他们就来翻译或注释这些书；或者还有种更轻易的办法，就是强制听讲者自己来翻译……”在这种僧侣般的教育模式下，斯密独立不倚地研究自己的学问。休谟所著的《人性论》，在这个时期被斯密精读过，对他影响很大。据说，有一天他正读这部著作时被发现了，受到学校当局的严厉训斥，书也被没收了。斯密一生与牛津大学关系很冷淡。即使他成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牛津毕业生时，这所大学也未按惯例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748年，斯密25岁时，成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讲授英国文学；并于1750—1751年冬讲授经济学，倡导自由贸易学说。1751年，斯密受聘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这是他一生中“收获最大、因而也过得最愉快、最体面的一段时期”。按苏格兰大学传统的学科分类法，逻辑学讲座的范围包括修辞学、文学在内，道德哲学讲座的范围包括法学、政治学在内，这四门课斯密在爱丁堡大学都讲过，但他似乎更爱好后者，所以不久就改任道德哲学教授。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分作自然神学、伦理学、正义原则和行政法令四个部分，他后来出版的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内容上分别与第二、第四个部分相关。

作为造诣精深的学者和成功的教师，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开始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青年人在斯密的影响下，学会了思考问题。一位教授曾在信中写道：格拉斯哥的青年人充满了探求精神，这是表明斯密教学效果的最好证据。斯密讲课的题目在这个小城风行一时，他的观点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书店的橱窗里摆着他的半身雕像，甚至很多人竞相模仿

他讲话的声调。

斯密在讲授道德哲学时，从一开始就宣传自由贸易思想。他在格拉斯哥担任教授的 13 年间，几乎使这座城市所有的人都信奉了他的学说。也就是说，早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斯密就明确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这种新思想，并赢得了现实世界中的第一批信奉者，初步显示出经济理论的巨大威力。据说，著名经济学家让·巴·萨伊于 1815 年访问格拉斯哥时，曾经坐在斯密昔日讲课坐的椅子上进行祈祷，并激动得声音颤抖地说：“主啊，让您的仆人安息吧！”他对斯密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格拉斯哥大学的 13 年中，斯密还承担过许多行政事务，曾长期担任学校的财务主管，他对先进的、新生的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积极支持它们的成长、壮大。格拉斯哥的同业公会不允许詹姆斯·瓦特在市内开办工场，斯密支持学校在校园内为瓦特拨出一间房子作车间，并让瓦特专门为学校制造制图仪器。斯密喜欢出入瓦特的车间，同这位富于创见的年轻人交谈。这位杰出的发明家也对斯密极为尊敬。1809 年，他用新发明的雕刻机完成的第一件作品，是亚当·斯密的小型象牙头像。

1759 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了，这一年他 36 岁这部书的问世，使他被公认为当时第一流的著述家。

《道德情操论》同斯密后来出版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虽然表面上内容迥异，但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世界不同侧面的看法，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在《道德情操论》中，他重点探讨了人在社会压力影响下的伦理行为。这部著作出版以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讲授。

1764年，斯密辞去了教授职位，从此结束了他辉煌的教学生涯。与此同时，一部内容宏大的经济学著作开始在他的头脑中酝酿。他先是担任一位英国贵族青年巴克勒的家庭教师，并陪同他到欧洲各地（主要是法国）旅行。巴黎之行使他与著名的重农主义者魁奈和杜尔阁结识，丰富了他的经济思想，使他能够更深刻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担任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三年之后，斯密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在隐居般的生活中全力倾注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写作。

关于斯密埋头写作这部书，还有一些轶事。据说，某个星期天的清晨，斯密穿着睡衣走出房间，到花园中散步。但在沉思冥想中，他沿着花园小径竟走上了外面的大道，一直走到15英里之外才被教堂的钟声惊醒。

伟大的经济学巨著终于在1776年3月9日出版了。这部书蕴含着渊博的知识，以明晰流畅的语言表达了深邃的经济思想。斯密的老朋友大卫·休谟在收到斯密的赠书后回信写道：“这是您本人、您的朋友以及社会都寄予无限希望的一本书……我相信，该书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敏锐的观念以及大量引人入胜的新奇实例，终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这部书对于经济学乃至人类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我们还要在后面提到。

1778年，55岁的斯密在爱丁堡租下了一所房子，从此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生。这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家，在其一生中基本上过着宁静、平凡的个人生活。据说他曾经爱恋过一位很美丽的姑娘，但终于还是终身未娶。与母亲、朋友及书籍在一起，是斯密的三大乐趣。他的藏书有三千多册，内容之丰富是罕见的。据后人统计，在斯密的藏书中，文学艺术

书籍占五分之一，希腊、拉丁古典著作占五分之一，法律、政治和传记类书籍占五分之一，政治经济学和历史著作占五分之一，余下的五分之一是科学和哲学书籍。由此可以看出，斯密的知识结构是非常全面的，这种深厚的功底，在他的经济学巨著中有着多方面的反映。

斯密晚年担任了苏格兰海关税务专员之职，他从公务中增加了很多实际知识，对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增补与修订起了一定作用。但这一职务却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他无法继续他的学术研究。本来，斯密曾抱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巨大计划，准备建立一个包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学说体系；但由于学术研究的中断，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过，晚年的斯密拥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英国当时不少政府要人都自称是斯密的弟子，在议会中讨论某些法案时，也常常有人引证斯密的著作。1787年，他到伦敦旅行，同他的忠实信徒、英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首相之一皮特又见了一面。据说，斯密是最后一个到达会面地点的，他一进屋，大家就全体起立欢迎他。斯密说道：“诸位，请坐！”皮特回答说：“不，您坐下，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1790年7月17日，星期六，一代经济学宗师亚当·斯密去世了，葬在卡农加蒂教堂的墓地。在他的墓上立着一块墓碑，上面写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

## “看不见的手”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

象，以经济自由为主线，阐述了以自利心为基础是整个经济过程。这部书内容浩瀚、包罗万象，涉及当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浏览一下这部著作，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初学者对经济现象的无知。然而，这部经济生活小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却是以深刻而简单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我们将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对该书内容作一简要勾勒：1. 分工；2. 自由竞争；3. 自然秩序。

## ○分工

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亚当·斯密在该书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在斯密看来，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国民财富的更快涌流，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分工何以能增进劳动生产力？他举了一个脍炙人口的例子：扣针制造业。一个劳动者如果不是专门制造扣针，那么纵然他竭力工作，恐怕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但按照分工的方法，不但扣针制造业专门化，而且这一职业内部也分成若干部门，其中大多数部门同样成为了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 18 种操作。……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 12 磅。以每磅中等针有 4000 枚



话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分工与文明社会的不解之缘。二百多年来，这段描绘给无数思索经济奥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度中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品罢！你就会看到，用其劳动的一部分（虽然仅仅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不可胜数的。例如，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就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物，势必要有牧羊者、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疏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加之，这些劳动者居住的地方，往往相隔很远，把材料由甲地运到乙地，该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者啊！……为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类的劳动啊！复杂机械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织工用的织机，姑且不论；单就简单器械如牧羊者剪羊毛时所用的剪刀来说，其制造就须经过许多种类的劳动。为了生产这极简单的剪刀，矿工、熔铁炉建造者、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等，必须把他们各种各样的技艺联结起来。……总之，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考虑到投在这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模式，也无法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

分工具有如此巨大的利益，在推动人类进步方面起着如此关键的作用，那么，分工这支魔杖是如何出现在世界上的？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分工是如何起源与形成的？

斯密认为，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是缓慢而逐渐地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互相交易。他指出，人类的交易倾向是一种无法分析的天然本能，为人类所共有，亦

为人类所特有。其他各种动物，似乎都不懂得什么协约交易。我们从未见过两条狗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任何动物，以某种信号向其他动物示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以此易彼。只有人能够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互通有无，相互帮助。就在这种交换过程中，产生出日益深广的分工体系：专门从事某种职业提高了产出效率，使自己能有更多的剩余物换得更多的产品，因而鼓励大家各自从事一种特定业务。

这样，以相互交易倾向为基础的人类分工，使各种经济力量相互结合，共同创造出国民总收入，创造出高于自给自足状态百倍千倍的福利，成为人类进步和幸福的真正源泉。这就是我们所见的经济发展、财富增进的写照。

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论断，在现代经济学中仍然受到高度重视。斯密的逻辑是，既然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那么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广狭的限制。假如市场太小，那就不利于分工的深化，因为专业化生产的产品有卖不出的危险。他举例说，有些业务只能在大都市经营，因为那里市场容量较大；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都开始于沿海、沿河地区。

### ○自由竞争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自由竞争的思想贯穿于全书各章。这段话集中概括了这种观点：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

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这样，斯密就主张解除政府或者君主的所谓“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或者说，政府应当尽量不去干涉私人经济。从资本投向来，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或追求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对于把资本运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自己的位置上，显然能比政治家或立法家作出好得多的判断。去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必定是无用的或有害的。斯密坚信，私人投资者“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讽刺说，从未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

这就是经济学中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原理。长期以来，这一原理构成了经济理论的核心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基础；现代经济学试图在高度抽象的形式上，用深奥的数理工具来证明它，这种努力持续至今。

因此，对于政府干预经济，斯密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政府若去干预产业活动，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怕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就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

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将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危险不过的事情。

斯密多次抨击政府对经济繁荣和发展的有害影响。他指出，政府的奢侈妄为是导致国家穷困的原因之一。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用来维持不生产者。在大多数场合，幸亏有公众的勤勉来弥补政府的浪费，才使社会经济得以维持和发展：

“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这就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对于英格兰政府，斯密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英格兰从来没有过很节俭的政府。英格兰的王公大臣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

此外，政府是个无效率的管理者。“政府的代办人和代理人的管理是疏忽的、浪费的和专横的。”他主张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必须刺激个人利益。

斯密对政府经济行为所作的经典分析，被当代公共选择理论所继承和发展，充分显示出他观察的深刻性及其论断的持久生命力。

但斯密并非对私人寄予无限信任。实际上，政府就是一些特殊个人的集合；对政府弊病的揭露背后，就已经隐含着斯密对个人人性弱点的洞察和警惕。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

他对垄断的批评上。他发现，“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通过限制自由竞争损害公共利益。他反对同业组合等垄断性组织，主张通过法律来保证竞争的充分性。这说明，斯密已经认识到竞争与垄断的奇特关系，看到了对竞争行为进行规范、以尽可能防止垄断产生的必要性。

自由贸易理论是斯密的自由竞争学说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他指出，如果外国能供应我们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我们最好就用对我们有利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这是对消费者有利的。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斯密指出，在战争或政治上，邻国的财富虽对我国有危险，但在贸易上，则对我国有利。应该使全国国民都认为，邻国的财富乃是本国可能获得财富的原因和机会。另一方面，斯密也承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绝对的自由贸易未必对本国有利；但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一种正确的原则。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者而著称于经济学领域，但他并未否定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而是认为政府应该在应有的方面严格履行自己的天职，这对于财富增进和人民福利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他认为，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政府或者说君主有三个应尽的义务：

“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

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 ○ 自然秩序

斯密的全部经济思想以自然秩序观为根本立足点。分工的和谐，自由竞争的奇妙机制，乃至货币、自然价格、自然工资、利润和地租、资本的组成部分、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本的运用，其实都是自然秩序的体现。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政治经济学不同流派的斗争，其实表现了自然秩序如何一步步击败人为秩序，冲破各种人为障碍与阻力，向前开拓自己的道路，并推动人类进步的。

自然秩序和自然法的观念以人性论为基础。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人的同情心这一侧面出发去研究道德世界；而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他从人的自利心这一侧面出发去研究经济世界。斯密作为一位正直、冷静的思想家，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从个人利益的追求中探究经济现象的合理解释。斯密认为，在经济行为中的个人利益追求，既然源自人类的本性，那么它就是一种合法的权利；除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外，这种求利行为不应该受到其他的限制。而且，不同个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共同的利益，由此就产生和演化出一个庞大的、自然的经济世界，或者说，一种建基于人类天性的经济秩序，一种最好的经济秩序。

经济世界的这种自然秩序还意味着，经济世界的宏伟轮廓绝不是由什么天才想象和设计出来的，也不可能由什么智

者加以控制和指导；它是千千万万人自发行动的奇迹般结果，其中每一个人只遵循自己的本性、服从自己的意志。

斯密并不否认社会利益。但他认为，社会利益由其众多成员的利益构成，所以应从个人本性和个人利益中引出社会利益来。个人利益的合理追求恰恰是社会利益增进的原因。

我们可以分工为例来理解斯密的自然秩序观。“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这就意味着，同人为的“智慧”相比，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的交易倾向才是决定性的原因，或者说，分工源于自然，是一种自然秩序。斯密进一步论证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一定是行不通的。他如果能刺激他们的利己心，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把我所要的东西给我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在这种交易过程中，人的求利本性就引导他们逐渐走向效率更高的分工，结果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由此看来，分工制度就是一种自然的制度。

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是斯密自然秩序观的一个有趣例子。在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中，每个生产者既不同其他生产者商量，也没有神明的指导，他如何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才能适合市场需求呢？

斯密以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的波动对此作出了解释。如果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不能满足有效需求，那些需求者中就会发生竞争，使市场价格或多或少地上升到自然价格之上。价格的上升引起商品供给增加，于是市场上商品稀缺程度逐渐缓解，市场价格就又下降到自然价格的水平上。如果

某种商品的供售量超过了它的有效需求，情况正好相反。

“这样，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这种奇妙现象的根源，在于供给、需求与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自然秩序：

“为使一种商品上市每年所使用的全部劳动量，自然会依着这个方式使自己适合于有效需求。其目的当然在于始终把适当商品量提供市场，使供给足够适应需求，而不超过需求”

这种自然秩序，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价格机制。

在斯密看来，货币的产生和流通也遵循着一种自然秩序。货币的产生不是某国人民深思熟虑作出决定的结果，而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为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而逐渐地、自然地尝试的结果；这种尝试和选择基于每个人自己的意志，却能使他们达到彼此协调。

他首先举例说明物物交换的不便，屠户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肉，放在店里；酿酒家和面包师固然愿意购买，但他们手中除酒和面包外没有其他可供交易的物品，而屠户已经拥有足够的酒和面包了。这样，他们之间就没有交易的可能，对每个人的利益增进都是一种障碍。

“然而，自分工确立以来，各时代各社会中，有思虑的人，为了避免这种不便，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